

浙江与日本

姚诚 沈国权

编著


浙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和经济发达的文明摇篮。早在距今约七、八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浙江北部山区活动。境内有距今10000年的上山文化，距今7000年—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6000年—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等。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海岸线长达2000公里，岛屿环列，海港众多。这一海域夏季盛行西南季风，西太平洋暖流穿过台湾海峡、琉球群岛，直到日本和朝鲜的对马海峡。可以说，浙江沿海得天独厚的水文和季风特征赋予了浙江通过海洋走向外部世界的机遇，给浙江先民向北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

杭州出版社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课题成果

浙江与日本

姚诚 沈国权 编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与日本/姚诚, 沈国权编著.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80758-446-9

I. ①浙… II. ①姚… ②沈… III. ①中日关系—杭州市
IV. ①D822.231.3②K295.5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4387 号

浙江与日本

姚诚 沈国权 编著

-
- 责任编辑 应伯根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社 址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310014)
电 话 0571—87997719
印 刷 杭州供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30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446-9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一衣带水七千年	1
弥生的虹桥——徐福东渡的往事	12
从鉴真到最澄	18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	26
源信、裔然献书与日本汉籍的回流	35
观音到此不肯去 海上神山涌普陀	41
一支佛法渐东海 早指扶桑回履舄	46
永平寺：日本的明州天童寺	52
无准师范与圆尔辨圆	60
南浦绍明的径山情结	65
赴日禅僧与日本禅宗鼎盛	70
浙江天目山：日本入元禅僧的圣地	76
径山与日本茶道	81
杭州尺八 日本生辉	88
浙江禅宗和日本五山文化	93
元日关系的修复者：一山一宁	103

田代三喜——浙江医学东传的高峰	108
禅门画圣雪舟等扬	113
阳明学与明治维新	119
日本馒头第一家——林净因的“奈良馒头”	126
柔道先驱陈元赞	130
日本艺术开拓者——东皋心越	135
日本的孔夫子：朱舜水	141
日本书法的兰亭、西泠缘	147
浙江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社会	154
罗振玉与中日文化交流	161
从藤野先生到内山完造	169
宁波人与日本近代人工孵化技术	178
附录一：浙江与日本友好交流大事记	184
附录二：中国禅宗传日法脉略表	194
附录三：浙江与日本友好城市一览表	195
参考书目	197
后记	199

每一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再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

——列维·斯特劳斯

前言：一衣带水七千年

在浙江省博物馆内,珍藏着一粒长 70 厘米、重 30 公斤的不锈钢雕塑:稻谷。这是 1990 年日本著名雕塑家田边光彰亲眼目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农具后,制作捐赠的特殊“文物”。稻谷,这一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食物之一,成为浙江与日本“直挂云帆二千里”姻缘的红绳,更是两地“一衣带水七千年”情谊的见证。

日本,位于中国东部,10 万年前,地壳运动、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日本列岛逐渐脱离大陆,形成孤立于西太平洋的弧状列岛。中国,是东亚地区的陆上大国,东临大海,是世界造船业和航海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伏羲氏曾“剡木为舟,剡木为楫”,黄帝则剖空树干制成舟船,把木头削尖为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中国与日本两国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即使在两国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年代,或者两国关系恶化乃至战争的时期,这片海域始终没有停止过舟船往返。

《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中日两国的来往：“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其中倭奴国曾经在公元 57 年遣使向汉朝通好，光武帝赠给他们“汉委奴国王”金印。此后，先后兴起的邪马台国、大和国等保持了与中原王朝的频繁联系与交往，并从这种交流中获取了推动本地区跨越式发展的物质资源与科技文化。公元 589 年，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中国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动乱，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迅速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开辟了中日关系的新纪元。当时，日本圣德太子，为了直接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以向中国派出遣隋使为起点，掀起了移植和输入中国先进文化、加强中央集权的全面改革。这是中国和日本作为两个统一国家正式交往的开始，也是日本统治者采取主动积极态度，直接吸收中国文明的开端。通过政府使团与民间商侣的往来活动，中日关系愈来愈密切，经济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中日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波友好往来的热潮，这股东风迅速打开了浙江与日本交往的历史篇章。

浙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和经济发达的文明摇篮，早在距今约 45 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在浙江北部山区活动。境内有距今 10000 年的上山文化、距今 7000 年—8000 年的跨湖桥文化、距今 6000 年—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等。地处东海之滨的浙江，海岸线长达 6486 公里，岛屿环列，海港众多。这一海域夏季盛行西南季风，西太平洋暖流穿过台湾海峡、琉球群岛，直到日本和朝鲜的对马

海峡。可以说,浙江沿海得天独厚的水文和季风特征赋予了浙江通过海洋走向外部世界的机遇,给浙江先民向北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气候条件。浙江先民们在临水而居的过程中具备了较高的造船能力、航行技术和地理天文知识等。在跨湖桥、河姆渡和良渚文化先民建舟造桨的基础上,常在水中的百越人不仅具有“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习性,而且非常善于建造各种用途、大小的船只,有扁舟、轻舟、舱、楼船等等。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越人就从浙东海岸出发向北航行,驶到较近的淮水或较远的济水,然后到达周王朝的统治中心。据说越王勾践从会稽迁都到琅琊时,动用“死士八千,戈船三百艘”,从内河入杭州湾,沿东海、黄海北上,争雄海上。可以说,越国地区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是闻名全国的,会稽(绍兴)和句章(宁波)是战国沿海的五大港口之一,《史记·平准书》中指出越国“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秦汉远距离沿海航行向深海航行发展,航海技术得到较大提高,“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是“不能一日而废舟楫”。

浙江与日本的直接交流究竟始于何时、何地与何人,至今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从考古来看,浙江与日本的最初相遇可以追溯到日本的绳纹文化时期,以浙江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稻作种植等技术传入日本,可以说:“日本的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玦状耳饰、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以及环壕聚落、坟丘墓的出现,都和中国江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据神田秀夫研究,中日古代历史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连锁关系,

如公元前 473 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 333 年楚威王灭越，致使大量难民乘船东渡。秦汉之际，由于天灾人祸等原因，南方部族不得不背井离乡，举族浮海北上，其中一部分人到达西日本一带，成为阵容强大的“渡来人”或“归化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日本最早的部落国家，带去了当时中国先进的养蚕、水稻、纺织、冶金等生产技术，促进了北九州、本州西部一带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发展。

三国时期，东吴的造船技术发展迅速，凭借着濒海的优势地位，积极开拓海上交通运输，《三国志·孙权传》曾提到：“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这里提到的亶洲，就是秦始皇派遣方士徐福带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的日本，从会稽出海向东航行，借着“黑潮”可以顺流漂到日本。此后，浙江与日本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南朝时，倭五王为了提高自己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12 次派遣使节到当时南朝的宋。隋唐时期，中日两国往来更加密切，公元 630 年—894 年，日本共派出 14 批数千人的遣唐使，他们大多以浙江的宁波或杭州湾为登陆点。他们“带来大量物品，经明州州府申报朝廷获批准后，一小部分人员进京‘朝贡’，其余皆民间就地‘实物互易’。即便是入京人员，回国前在明州亦是‘下船往市’”。这些商贸活动不仅活跃了明州地区的贸易，而且开始把浙江与日本紧密地联系起来。

公元 894 年，日本政府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持续近 300 年的中日官方外交联系。五代，随着海上航线的拓展、港口城市的崛起和地区经济的日益繁荣，浙江不仅成为全国政

室、经济、文化重心,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公元 909 年—959 年,往返于吴越国与日本之间的商船有蒋承勋、蒋袞、陈仁满、周良史等数 10 位。如公元 935 年,蒋承勋出使日本,第二年蒋承勋、季盈张再次出使日本,受到日本太宰府的接待,并且带回了日本左大臣藤原忠平致吴越国王钱元瓘的信。947 年,商人蒋袞以吴越王使臣身份出使日本,带去书信、土特产等物品,随后带回日本国左大臣藤原实赖致吴越王的信及沙金 200 两。953 年,吴越王钱弘俶又派蒋承勋出访日本,带去书信、锦、绮等丝织珍品。吴越国商船在经营对日贸易的活动中,常常成为沟通吴越国与日本政治、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且在日本僧人赴浙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宋元时期,浙江与日本的僧侣和商人构成了中日两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以宁波为中心港口的浙江迅速跃升为中外交通的枢纽。公元 999 年,朝廷“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全权负责管理对外贸易等涉外事务。1080 年,北宋政府规定明州市舶司是管理对日本、高丽贸易的唯一合法机构。南宋开始,浙江独领中日文化交流之风骚,每年仅开往两浙的日本船只就有四五十艘,接近每周一趟的定期航班,成为大陆与日本往来的主要渠道。不仅官方使节、朝贡贸易终年不绝,民间的宗教传播、文化交流、海上贸易、旅游移民等也十分兴盛。宋、元两代,文化交流方面仅知道姓名的赴华日本僧人就达 300 多人,不少人在中国各地游历长达数十年,他们直接将中国当时的科技、文化和社会习俗等传到日本,其交流的密切程度与交流领域远远超过遣唐使。如 1072

年，日本僧人成寻抵达台州巡法，向宋朝进贡。1078年，日本僧人仲回作为使节入宋，进贡纒200匹、水银5000两，宋神宗赐他“慕化怀德大师”称号，等等。

明朝，史籍记载的120多次中日官方、民间往来中，通过浙江的有50次，日本遣明勘合贸易船大多在宁波驻泊。明清鼎革，浙江沿海成为抵抗满清的重要基地，许多人奔走在中日两国之间，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当战争或起义失败后，大量明朝遗民东渡日本，再次将中国先进的文化、技术、艺术等传到日本，如朱子学、阳明学等就是以浙江为以起点东传日本。清朝，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使浙江与日本近千年车旅不绝的官方往来几乎断绝，直到1895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来杭与浙江有关方面会勘通商场界址，再次接通了浙江与日本的官方渠道。

自宋至清，浙江扮演着日本文人学士、僧侣商贾目的地的角色，中国文化主要体现为浙江文化的对日传播。浙江与日本之间的往来几乎囊括了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各个领域。例如，日本最主要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等，主要是从浙江传入日本。影响日本近代社会的重要思想阳明学、水户儒学等，也主要从浙江传入日本。此外，浙江是中国造纸业的故乡，也是雕版印刷的发达地区，杭州雕印的佛教典籍是日韩等国僧俗求取的至宝。浙江是中国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种茶和饮茶文化就是从南宋时期的浙江传播到日本。毫不夸张地说，中日之间1000多年的频繁交流、合作，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浙江与日本的交流、合作。

往事如烟,纵观浙江与日本此起彼伏的友好往来,有三点值得我们记取。

首先,交流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事业,需要勇气、智慧与坚持。

今天,早晨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发,中午,我们就可以在东京的银座逛街吃饭。对于古代中日两国的先民来说,浩瀚的海洋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跨越中日之间的这片海域,实现人与人的直接往来,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不仅需要庞大的财力与人力支持,需要克服无数的困难与挑战,更要具有勇于赴死的信念,直面葬身鱼腹的危险,否则,就无法到达那个令人憧憬的遥远异乡。

然而,海峡虽深,海浪虽高,阻隔不了两岸居民的往来,浙江与日本两地的政府使者、文人宦宦、僧侣商人以大无畏的勇气,冲破自然、地理、历史、文化与战争等种种障碍,扬帆启航,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去探索“日出与日落处”那个未知的世界。唐代律宗高僧鉴真为了东渡日本,六次出海,九死一生、历经劫难到达日本,同行的许多人都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公元834年,日本仁明天皇任命的遣唐使几经曲折,6年后才渡海成功,其中,仅一次出航就因风暴等使110多人葬身大海,超过全体出航人数的六分之一。正是这样一批批不畏艰险者前仆后继的努力,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凝聚起日本与中国的友好纽带,使两地人民保持了长期紧密的联系。日本僧人月江正印的诗真实地表达了当时渡海僧人的心境:

与云为友跨鲸鳌，袖有摩尼意所高。
东海麒麟擎玉角，南山狮子奋金毛。
饱参江浙诸知识，惯看钱塘八月涛。
忘却家乡旧时路，好山随处拥禅袍。

其次，交流是推动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不论是古代的中华文明，还是近代的西洋文明，外来文明直接影响和塑造了日本的成长、发展，在那里，外来文明的基因深深地注入了日本文化之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古典与时尚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古代日本还是近代中国，都受惠于对外来文明的开放和接纳，通过学习不断地丰富、影响和推动着文明的发展。

公元540年，有7513户大陆居民移住日本，把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手工技艺和文化知识带到日本，为日本经济社会的开发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后，中国与日本货物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商品有铜钱、香料、药品、经卷、书籍、中国画、文具、纺织品、陶瓷器等，尽管吴越商船频频东渡，但中国商品还是供不应求，日本诗歌这样描写公卿大臣们购买中国货物的情况：“叫卖声传内库官，蜂拥总角各争先。”1468年，遣明使一行带来了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亲笔信，明确提出要求赐给铜钱和书籍：“我国在书籍和铜钱方面一直仰仗上国的赐予，今特求二物，伏希奏达，特望允之。永乐年间，上国多赐铜钱，而近年来无此大举，为此，我国库中已索然空荡，无以安民。臣急待赐予。”可以说，通过不同渠道传入日

本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如饮食、服饰、节令、婚丧、科技、历法、医学、娱乐等,对日本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对日本文明的发展具有突出的贡献和影响。譬如历法,日本从公元690年使用中国的元嘉历开始,到公元1684年采用日本自己的贞享历为止,一直直接使用中国传到日本的历书。就在日本全面学习和引进中国文明成果的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帮助与推动也比比皆是。除中日两国之间的货物贸易丰富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供应之外,由于日本盛产直径达到四五丈的杉木和罗木,为中国寺院建筑提供了帮助。如公元1187年,天童寺重修千佛阁,荣西便在回国后运来了许多木材。重源曾将日本周防国的木料运输到中国,帮助建造明州育王山的舍利殿。1242年,圣一国师得知径山万寿禅寺失火,就动员博多承天寺的建造者、浙江临安人谢国明募集数千木板运来,等等。此外,日本输入中国的木材、黄金、日本刀、珍珠、日本扇、螺钿、铜等,得到中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和喜爱。

最后,交流是一种互动的过程,传递着物资、文化和友谊。

中日之间在长期的往来和交流过程中,两地文化通过接触、选择和融合,形成了唇齿相依、互相影响的民族间关系。双方学者、僧侣和人民在接触与交流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涌现出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友好使者。据文献记载,公元239年和243年,女王卑弥呼两次派遣使者向汉朝纳贡;413年—502年,仁德、反正、允恭、安康和雄略五位天皇先后

13次遣使朝贡，开创了早期中日之间友好往来的高潮。此后，中国典籍不断进入日本，据9世纪后期日本人藤原佐世所编《本朝见在书目录》记载，这一时期存在日本大学寮、图书馆、弘文院、太政官文殿等国家公务机构的文献典籍1568种16725卷，占中国隋、唐两代汉籍总量的50%以上，其规模和影响在世界文化和交通史上是空前的。同样，由于中国长期战乱导致各种经籍图书散毁严重，许多书籍在中国失传，日本在汉籍文献保存和对外传播方面，创造了丰富而生动的场面。如南朝学者皇侃著有《论语义疏》，后因朱熹《论语集注》流传而废止以致失传。1750年，根本逊志在下野的足利学校书库中抄写了一个本子，传回中国，对清代考证学带来很大的影响，促使阮元完成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唐《新修本草》早在宋哲宗元祐年间便已经失传，1889年，中国学者傅云龙在日本东京找到731年《新修本草》写本的摹抄本10卷，使亡佚800多年的本草学巨著在故土重现。

隋唐开始，当一批批日本学生和僧侣，不畏艰险，劈波斩浪，来华留学，中国朝野各界的学者、文人、艺术家、医生和高僧等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指导与关心，双方之间建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如李白与阿倍仲麻吕，荣西与虚庵怀敞，天童如净与道元，等等。及至近代，中日交流发生了逆转，中国各地的青年学生、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好像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形成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盛极一时的留日奇观。在这个“以日为师”的留学风潮中，许多日

本教育家为培养中国留学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谱写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如藤野严九郎对鲁迅的关怀使他终生铭记在心,内山完造为中日文化交流付出了一生的心血,嘉纳治五郎长期为赴日留学生开办语言培训学校,为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教育费尽心机,松本龟次郎专门从事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工作,始终不渝地献身于教育中国学生的工作,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主人。

总的来看,中日两国漫长的历史交往中,友好是主线,而且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友好的。虽然发生过倭寇侵袭、忽必烈东征和中日战争,但这些历史长河中的瞬间和片断,远远不能抹杀两国先贤、商侣、僧人和学者等用生命踏出的友好之路。站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人民要继承先民劈涛斩浪的勇气与胸怀,用心学习和吸收双方的优秀成果,以开放、前瞻的眼光与宽容、大气的胸怀,了解对方、理解对方、接纳对方,共同开创和谐发展的“东亚共同体”,实现经济互存、政治互助与文化互补。

弥生的虹桥——徐福东渡的往事

如果说中日两国的友好往来是一条绵延不绝的古道,那么,跨出这条道路第一步的是位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就是中国秦始皇时期的方士徐福。

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一直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饶有趣味并值得探究的问题,从渤海湾边的烟台、崂山到东海之滨的宁波、舟山,从古代中国的民间到现代日本的记载和风俗,都留下了众多的遗迹与传说。

自战国至秦汉,盛传燕、齐等国东面的海洋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仙岛”,岛上到处是奇花芳草、珍禽异兽,天仙海神住着用黄金、珠宝盖成的楼台殿阁,饮着琼浆玉液,吃着灵丹妙药,可以长生不老。于是,王侯将相大多热衷于神仙之道,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都曾经接二连三地派遣船队去探险寻仙,一些沿海居民为了躲避战乱兵祸,亦冒险驾舟下海,企图在海外得到一片安身的乐土,于是,出海成为寻找人间乐土的一种努力。在历时几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动中,出现了像安期生、韩众、卢生、少君等一大批方术之士。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征服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加强民族统一的举措。为